

试论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保存与展示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and Memory Preservation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史 勇

Shi Yong

(甘肃省文物局, 兰州, 730030)

(Gansu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anzhou, 730030)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 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相关文物收藏机构, 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不同程度开展了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及陈列展览工作, 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体系, 为辛亥革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必要基础。受时代限制, 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开展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及展示工作不同程度存在问题或短板, 所征藏之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的教化育人功能亦未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文物收藏机构 辛亥革命 实物与文献 征集与展示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relevant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useums, especially the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Party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Exhibition Hall of Party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 carried out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varying degrees, initially forming a historical memory preservation system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overing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which laid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stricted by the times,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arried out by the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has problems or shortcomings in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s not bee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ultural relics and documents;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辛亥鼎革, 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即提出应及时征集和保护辛亥革命物证, 收集辛亥革命史料, 编

纂辛亥革命史。但因北洋当局视辛亥革命先烈为乱党, 故彼时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工作多属自发零

星之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辛亥革命史叙述与传播视为构建其执政合法性、塑造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相关博物馆，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及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以下简称党史馆）等文物收藏机构不同程度开展了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辛亥光复、中华革命党等为主线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抢救保存及陈列展览工作。关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展示传播问题，学界已有所研究^①。本文拟聚焦于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这一基础工作，兼论相关陈列展览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既有著述、已刊布档案、党史会文献、当事者日记等资料，简要考察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保存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相关工作，以期为深化民国博物馆史和辛亥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史的研究抛砖引玉。

一、实物与文献之征藏

（一）文物收藏机构与地方博物馆之相关工作

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或专门特色：一是辛亥革命策源地或革命进程中历史事件发生地之文物收藏机构，或其藏品以辛亥革命为特色，或其自身定位即为抢救保存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历史记忆；二是侧重征藏某一门类之辛亥革命物证。兹以典型机构为例略述如下。

1. 辛亥革命策源地或革命进程中历史事件发生地之文物收藏机构

（1）湖北革命实录馆。1912年6月，辛亥革命元勋孙武、张振武、邓玉麟、谢石钦等十四人联合呈请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设立湖北革命实录馆。馆址设在汉口英租界普海春番菜馆，原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任馆长，配有总纂、编

修、文牍、典守调查、翻译、会计、庶务等，共三十五人。该馆成立后，一方面采取登报公告和派员调查两种方式面向全国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另一方面函请各省都督、临时议会及湖北省内各政府衙门、军事单位、各府县及个人送交档案和回忆录等。实录馆收集的史料除旧籍近著外，主要是公私文牍，其中包括清政府和辛亥首义后军政府形成的文件档案及私人函电。至1913年秋撤销前，该馆收集战事日记、革命团体和机关历史沿革、办事章程、大事记、革命党人事略等档案史料五百余件，并编辑有《湖北革命实录》共八册^[1]。

（2）江苏革命博物馆。1927年12月，江苏省政府以该省自清末以来素有光荣革命传统，议决设立江苏革命博物馆，陈列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革命纪念物品，博物馆筹备处附设于省民政厅。1929年1月，确定馆址设于南京瞻园。根据《江苏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组织简章》和《江苏革命博物馆征集细则》，该馆藏品征集对象以辛亥革命文物史料为主；筹备期间，该馆除委派征集员赴省内各地及上海等周边地区寻访外，还采取致函省内各县政府请求协助、在报纸刊登启事、在地方聘请名誉征集员等方式开展征集工作。1929至1931年期间，时任馆长陈去病亲率馆员赴相关省份征集辛亥革命文物。该馆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成立最早、藏品较为丰富的辛亥革命专题博物馆。其代表性藏品包括：黄花岗起义烈士韩恢血衣、秋瑾遗像、江宁县辛亥革命档案及《辛亥攻宁一月》等革命文献；值得一提的是，馆方认为前清官府截角旧印系鼎革象征，见证了辛亥革命历史，故函请省民政厅将全省光复后集中呈缴的六十县截角旧印拨交该馆陈列展示。该馆创办有《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作为宣传和交流平台。媒体认为该馆之意义在于“表现吾民族自由独立之精神，并使编革命史者有确实可征之资料”^[2]。

（3）广州市市立博物院。1928年，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创设；次年对外开放。该院主事者因“广东

^① 国内学界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和党史馆。参见曹必宏：《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的筹建与初期展览》，《上海档案》2012年第8期；陈蕴茜：《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

为历史革命策源地，伏念总理手泽，先烈遗品与大革命纪念物品，无一不可兴民众观感，回顾缔造功勋。律以饮水思源之义，更当汇集院内，垂诸久远”^[3]。故制定有《征求革命纪念品简章》，明确九项革命纪念品征集范围：总理及先烈生前用品及手迹；镇南关革命时所制之军用票；革命军各役之军用票；海外筹饷之军债票；革命军各役军界同志足资纪念之器械；总理颁发革命军各役军界同志印信及委任状手书方略等件；总理颁发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海内外党部及主盟人之印信委任状手书等件；各同志因革命入狱之手足镣等刑具；其他具有革命纪念价值之品物^[4]。应征革命纪念品经该院筹备委员会鉴定确认具有陈列展览价值的，且具有捐送、确实介绍所征集品物十份以上或借用品物陈列时间一个月以上两类情形之一者，给予如下五类奖励：呈请市政府给奖，本院发给奖章，悬本人肖像并将芳名勒碑院内永留纪念，赠本院出版物及纪念品，登报表扬^[5]。征集所得革命先烈纪念物品在越秀山镇海楼该院第五层专门陈列。

2. 注重辛亥革命物证专题征藏的相关地方博物馆

(1) 天津博物院。1916年，天津博物院筹备处成立。该院筹备期间，即已注意到辛亥革命物证的历史价值，在其所征集之陈列品中，以各地光复后发行之货币为特色。如四川军政府铸汉字铜币，“是为革命时之纪念币也”；江西铸陆军十八星徽章铜币“有中华民国四字”；湖南亦铸同款铜币，“花纹同而字异耳”^[6]。

(2)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1929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成立。该馆征藏之辛亥革命藏品以革命先烈照片或墨迹为特色，包括邹容及辛亥革命诸先烈照片^[7]。该馆历史文化部革命纪念品陈列室专门展示“凡有功党国之革命伟人烈士，不论团体个人之照片，或遗物，及各种墨迹等品”^[8]。

(二) 国民党中央党史部门之相关工作

辛亥革命史是国民党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辛

亥革命史叙述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很早就开始纂述辛亥革命史，并将历史叙述与革命教育相结合，以获得人们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9]。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6年10月，建成开放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36年和1942年，国民党党史会先后颁行《史料征集通则》和《史料征集简则》，明确“凡本党党务进展上之组织活动及本党总理、总裁暨先烈先进革命过程中之行动思想，无论为文献或实物，皆为本党史料，而在征集之列。其他与本党党史有相当关系，可资参证者，亦酌量征集”，同时建立了常态化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和奖励制度，凡应征之包括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在内的国民党党史史料，须经党史会征集处登记甄选、编辑处审订、总纂办公处复核判定三道程序方可入藏。每半年叙奖一次，分为颁发奖状和专函申谢两种形式；奖状又分甲乙丙三等。对于珍稀文物史料，由党史会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褒奖，或赠予党史会委员（多系国民党元老）墨宝，或酌情颁发奖金^[10]。

因国民政府有着行政资源方面的先天优势，故当时国民党中央党史部门所征藏之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的广度与深度也令其他文物收藏机构难以望其项背。其所征集之实物与文献丰富多样，大致分为如下几类，兹举例述之。

(1) 工作报告。黄兴和胡汉民于黄花岗起义失利后，曾撰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举义报告书》，对黄花岗起义的计划、人员构成、举事经过、战斗细节、失利原因皆有详细记述，同时还列出了战前经费与武器筹措和战后消耗统计等数据。党史会征得报告抄本，并在编者按中高度评价黄花岗起义的历史意义：“经此一役，遂造成武昌首义之成功。”^[11]

(2) 影像资料。武昌首义刚刚爆发，商务印书馆即于1911年10月刊行《大革命写真画》首册；至1912年4月，共十五册出齐，共收录照片约600幅，真实、直观地保存了光复时各省革命动态，具有很强的历史即视感和珍贵的史料价值。贵州省保

安处第六科包净六曾藏有一套完整的《大革命写真画》，于1941年捐献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2]。

(3) 新闻报道资料。时事新报馆于1911年11月印行《中国革命志》，凡十八章，包括广州黄花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首义、湖北军政府之内政外交、各省响应与光复情况等，“记载颇详，可资参考”^[12]。

(4) 个人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与叙述。辛亥革命元勋林述庆逝世前著有回忆录《江左用兵记》，详细记述了江苏省响应武昌首义的历史图景，以亲历者视角还原了攻克江宁、规复镇江、海军反正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在前言中还为回忆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背书曰：“不佞因汇述所躬历目睹者，一一记之。一字一句，皆从良知写出；若故事铺张，稍涉诈伪，实共弃之。”^[13]

国民党党史会征集到的辛亥革命元老蒋群口述之记录稿《辛亥江西光复记》，包括叙言、九江独立之酝酿、起义经过与组织军政府、江防之布置、南昌响应、长江下游及云南独立之策动、联合海军、全省统一、推举代表欢迎总理就任大总统、九江光复之重要性十部分，全篇近万字^[14]。国民党党史会曾先后五次访问革命元勋李烈钧，其除自述少年时代之革命思想、留学东京情形及返国后从事革命之经过外，对辛亥革命及辛亥前在江西、云南之革命活动，“叙述尤详”。党史会据此编成《革命先进访问记》一文^[15]。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和党史馆对不同观点与出处的辛亥革命文献史料，多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注重拾遗补缺。如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情形，党史会征得《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烈士表》，内分第一次列碑者喻培伦等七十二烈士，第二次列碑者徐国泰等十三烈士及尚未列碑之李祖恩一人；共计八十六人，分列三表。“年籍及就义情形，均甚详明”。该表同时注明编纂理由：系因此前邹鲁编著之《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曾将殉难诸烈士列为一表，然遗误尚多，“兹将年来所得，再表而出版，为补遗之作”^[16]。又如党史馆负责人邵元冲在审阅蔡济民与吴醒汉合编之《都督府组织与北伐军

改编》及居正编纂之《辛亥劄记》时，虽认为与其他数种史料“尚多出入之处，则考定犹难言也”，但同时亦肯定其“所记尚多，可资考证”^[17]。

有的应征史料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矛盾和斗争甚至革命元老的个人意气之争。如1936年5月，云南刘德泽向党史馆送缴《中华革命党外史》一部，邵元冲审阅后认为：“颇多可参考处，唯中间于政学会沮遏，总理及仇党诸事迹，则于今为烈何主魁枋者之不寤也。”^[18]辛亥首义元勋之一，时任党史会纂修的吴醒汉亦曾自撰武昌首义回忆录，多次与邵元冲沟通，不仅对官修辛亥革命史存有异议，甚至不欢而散。邵氏1936年6月2日日记载：“午前吴醒汉来述武汉起义史实，与党史会所辑者不同，希望订正云云，少谈去。”^[19]同年8月20日日记又载：“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吴醒汉以辛亥武昌起义史料来，余告以修订时，当作参考。彼意必欲以其材料为完全根据，嗷嗷不已，殊为悞妄。”^[20]

二、陈列展览及存在之问题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央层面宏而广、地方层面专而精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体系，体现出专业化、专题化、地域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中央及地方文物收藏机构亦策划举办了若干以辛亥革命为主题或包含辛亥革命内容的陈列展览；如江苏革命博物馆之基本陈列、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之辛亥革命文物专题展览、天津和浙江等地综合性博物馆之辛亥革命文物展示。

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陈列展览和历史记忆阐释的“龙头”或主阵地。该馆陈列展览分常设展和临时纪念展览两类，常设展主要陈列展示国民党党史会征藏之实物与文献，由于辛亥革命史是国民党党史的最重要部分，史料亦最为丰富，尤其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史料占据了国民党党史史料的主体。除举办常设展外，党史馆亦不定期举办临时特展，“每逢纪念日，将有关此事史料，临时补充，或标注各种符号，藉使

来宾阅览，以加重纪念之意义。过去如总理逝世及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殉国纪念日，均有举行，以是参观来宾，较平时更形踊跃”。党史馆开馆后，“车水马龙，中山东路，如山阴道上，素称冷落之明官遗址，顿形热闹”，由此可以“想见一般国民对于党国史迹之崇敬与兴趣”。据统计，党史馆开放7个月后的观众量即达125.6万人次。即便在抗战时期迁都重庆后，党史馆仍然坚持在重庆及周边巴县等地区举办党史和革命史展览，以鼓舞民心士气和激励抗战斗志^[9]。此外，每逢内忧外患之际——如外寇入侵或内战失利——党史馆亦试图利用以辛亥革命陈列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陈列展览帮助民国政府维护统治。

但是，由于以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为主体的所谓革命文物陈列以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局限性，相关陈列展览工作亦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与缺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实物较少导致陈列展览质量不高

以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为例，早在筹备期间，邵元冲即意识到实物缺乏必将导致展览吸引力下降：“史料之陈列如尽多偏重于相片纪述，或以前之公报、报章等物，必难使人引起深刻之观感，则自不得不有所顾虑。”因此在党史馆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变通之策：“及之我人，固须尽力征求实物史料，但亦不可以实物征集困难与材料缺乏便‘因噎废食’而停止工作，我人不妨暂将相片、公牍、书报、遗墨、印信等史料作为主体，先将第一层楼布置。”^[21]及至开馆前夕，“预备陈列之实物尚未征集齐备”，如果完全以文献为展品主体，“殊对中央及各方有失信用”，邵元冲不得不再次提出：“派员向江苏博物馆调借实物陈列，或由各纂修采访出动，分向各革命先进先烈后嗣接洽征求本党各种纪念品暨先烈遗物，并将可征得之件开列名称、数量、收藏人各项，以便统计及预留陈列位置。”^[22]

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与传播也是各地民众教育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典型如山东省立民众教育

馆内设之革命纪念馆，主要陈列辛亥革命前后之先烈遗像、传略、遗墨、挂图及革命事迹照片600余件，“或悬墙壁，或镶入玻璃镜架，俱有详细说明”^[23]。由此亦可反映出这一陈列实物少而文献照片多、侧重所谓党义灌输而忽视参观体验，这也是民国时期各地民众教育馆辛亥革命史陈列的通病。

（二）相关机构内部存在弊端或掣肘

仍以国民党党史会和党史馆为例，由《邵元冲日记》可见端倪。1936年6月11日：“午前赴财务委员会，讨论党史陈列馆预算事，决定不作独立预算，只在党史会经常费内月加2000元，于实际颇为支绌，然四海困穷，此后能维持几时，尚是问题，尚安能谈充裕耶。”^[24]同年6月18日：“陶林英、许师慎来述党史会事，知内部颇有派别及专擅之人；青年不知谦逊收敛，此后为祸为福殊未可知也。”^[25]同年7月6日：“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并处分验收史料陈列馆工程，及迁移档案事。党史会人员作事终不上紧，泄泄沓沓，令人闷损。正午归。”^[26]同年8月28日：“午后王扶生来陈述党史会积弊。”^[27]经费困难、派别林立、作风拖沓，国民党党史会和党史馆内部管理运行之种种弊端，多少影响了整体事业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集与展示工作。

（三）相关陈列展览不合时宜

随着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集工作的深入和存量增加，国民党官方亦结合时局发展有针对性地举办主题展览。如“九一八”事变后，因“辽藩失守、强寇入室，民气消沉、国难日亟”，国民党党史会举办党史史料展览会，“藉图激励人心振作民族精神也”。1932年12月18日开幕，一周内观众数万人。展品分为总理史料（1600余件）和先烈史料、册籍纪念品（400余件）等，分为十个陈列室，其中半数展室陈列展览为兴中会、同盟会、辛亥光复、中华革命党等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之内容。展览宗旨是“际此国难严重时期，缅怀民国缔造之艰难，先烈殉国之悲壮，抚今思昔寓意尤为深

长”^[28]。该展览用意虽好，但由于当局执行不抵抗政策，辛亥先烈之精神和事迹固然能够鼓舞民众，但对收复失地亦无能力，徒叹奈何。又如1947年3月29日至4月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国民党党史会、上海市立博物馆联合举办“革命文物展览会”；展品共890件，分为四类：国父史料（161件）；先烈史料（219件）；革命文献（349件）；革命纪念品（161件）。在展览引言中有这样的话语：“当我们看了革命的文物以后，对于过去先烈们的奋斗，革命的艰苦，以及成功的伟大，都能引起很鲜明很深刻的印象，这样便能淬发我们的精神，磨砺我们的志气，使先烈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脑海中继续滋长。”^[29]时值解放战争正酣，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已处强弩之末，这是将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之教化育人功能用错了地方，这种精神胜利法显然无法抵挡人民解放的历史洪流。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但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30]。同样，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开展的以实物与文献征藏为基础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工作，虽然客观上抢救保存了一批与辛亥革命相关之珍贵文献或实物，为辛亥革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奠定了一定资料基础，但囿于时代局限性，在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阐释、展示与传播、社会教育等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同样也是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者。据作者不完全统计，自1961年以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南京中山陵、黄兴故居等10多处辛亥革命遗迹被先后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和广东、上海等地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以及各地综合性博物馆的相关陈列展览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展示体系。进入新时代，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保护传承事业必将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391.
- [2] 魏星, 刘东华. 鲜为人知的民国时期江苏革命博物馆[J]. 档案与建设, 2019(8).
- [3]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征集陈列品物宣言[R]//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第四期, 1929: 113.
- [4]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征求品物类别[R]//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第四期, 1929: 114.
- [5]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征集陈列品物奖励规程[R]//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第四期, 1929: 115.
- [6] 天津博物院陈列品说明书第一辑(历史部货币类)[M]. 天津博物院筹备处, 1917: 41.
- [7]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物品目录[R], 1932: 45.
- [8]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概况[J]. 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号, 1933: 3.
- [9] 陈蕴茜.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J]. 江海学刊, 2013(5).
- [10] 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应征史料叙奖办法[J]. 党史史料丛刊创刊号, 1944: 66.
- [11] 黄兴, 胡汉民.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举义报告书[J]. 党史史料丛刊第三期, (1944-11-12): 26-33.

- [1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新征史料摘述[J]. 征集简讯第一期, (1942-2-10): 2.
- [13] 林述庆. 江左用兵记[J]. 党史史料丛刊第四期. (1945-11): 7-16.
- [1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新征史料摘述[J]. 征集简讯第四期. (1942-5-10): 2.
- [1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新征史料摘述[J]. 征集简讯第七期. (1942-8-10): 3.
- [1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新征史料摘述[J]. 征集简讯第九期. (1942-10-10): 2.
- [17] 邵元冲日记1936年5月31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41.
- [18] 邵元冲日记1936年5月27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39.
- [19] 邵元冲日记1936年6月2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42.
- [20] 邵元冲日记1936年8月20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69.
- [21] 党史史料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36年8月22日)//龙锋, 黄颖, 孙骊君.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筹设史料一组[J]. 民国档案, 2012(2): 38.
- [22] 党史史料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1936年9月8日)//龙锋, 黄颖, 孙骊君.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筹设史料一组[J]. 民国档案, 2012(2): 39-40.
- [23]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M].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印, 1933: 9.
- [24] 邵元冲日记1936年6月11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47.
- [25] 邵元冲日记1936年6月18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51.
- [26] 邵元冲日记1936年7月6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56.
- [27] 邵元冲日记1936年8月28日条[M]//郭军丽, 选编. 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72.
- [28] 特种工作[R]//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报告, 1933.
- [29]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革命文物展览会陈列品目录[M]. 上海: 上海市立博物馆, 1947.
- [30] 习近平.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OL]. (2021-10-0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1009/c1024-32248616.html>.